

心，所以尊他为“敬神家”，他也因此更沾沾自喜，不管别人的反映如何了。

张焕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奉行“流芳遗臭各千秋”的历史观，对世人的评说满不在乎。他曾写诗云：“如山铁案无轻重，似水流年任短长。”然而历史的裁决是无情的，铁案确实如山重，任凭谁也否认推翻不了的。张焕相以政治流氓的戏谑态度对待历史，到头来还得接受人民正义的审判，逃脱不了汉奸的恶名，这就是历史对他的惩罚。

（摘自《汉奸秘闻录》）

我心甘情愿地当了汉奸

阮振铎

1918年4月，我从南满医学堂（在沈阳日本站附属地内）毕业后，就在奉天满铁医院充当医员，给日本人服务。1920年又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做研究工作，就更深一层接受了日本的教育。因为和日本人接触了七八年之久，养成了崇日亲日思想，看不起祖国的一切，竟把日本的医学校完全看做能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材的地方，不明白日本的用意是要将中国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设立医学校，正是为推行这种政策的措施之一。由于我的崇日亲日思想较深，所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由给日本帝国主义者金井章次（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医学博士）作帮凶起，加入到伪政权。我和金井的结识，是从我在奉天公立医院当院长时（1923年--1929年），因1928年通辽一带发生鼠疫，为办防疫开始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金井章次充当辽宁省城地方维持会最高顾问，当时我在长春吉长吉敦铁路医院当院长（1930年—1931年），由于他的介绍，我于同年11月7日就当上了辽宁省地方维持会顾问。这是我认敌为友甘心放弃了十七八年的医业，做了日帝国主义者走狗的开端。我在吉长医院每月薪水450元，并未感到生活困难，日本人也未曾威胁过我，可是竟甘心去当所谓顾问，只是为贪图更多得些收入，过更富裕的生活。置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

同年12月16日维持会解散，伪奉天省公署成立，臧式毅为伪奉天省长，委我为伪秘书长。1932年12月我转任“新京国都建设局长”，为简任二等，是继日人丸山局长的后任。当时正值施行伪国都第一期五年建设计划的第一年，收买长春附廓土地，并为此组织了“国都建设计划咨询委员会”，委员长由我兼任，副委员长是伪长春县长宋德玉、长春商会会长王荆山，委员是伪国道局长植木伦太郎、伪民政部地方司长、伪中央银行理事和在建设区域内各村屯的村长等。并为此开过一次会，是在长春大马路伪国务院会议室（原吉长道尹公署）内举行的，主要内容为关于买卖土地价格的咨询和说明建设计划的概略。对于土地收买价格，是把土地定出等级，按等级定价，即每亩20元至45元；出卖地皮价定为：商店街每坪20元至40元；住宅区一律8元。对于第一期建设，计划区域为100万平方公里。从1932年到1937年实际施工建设的区域仅21万平方公里，仅此就消灭了新发屯、杏花村、杨家林子等若干个村屯。在这区域内的农民，因为土地被收买，迁移到指定地区伊通河东岸二道河子重新立户，无地可种，就造成了多数人失业，过着流浪生活。而新建设的区内，则完全是日本大会社、工商业铺店和伪政权官吏住宅以及会社员的住宅，我在原新发屯附近领了400

平方米地皮建筑楼房。

1933年，我同伪建设局计划科长沟江五月赴日本视察东京、京都、名古屋、大阪、神户、福冈的都市建设，回来后到奉天、吉林、哈尔滨、安东、大连替建设伪国都做出卖地皮的宣传，结果中国人买地皮的极少，绝大多数为日本商人买去。

此外，在伪建设局长任内，兼伪国道局国道会议委员。委员长是伪国道局长植木，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地点也在大马路伪国务院会议室，由植木说明国道对于交通治安的重要性等。我还兼任伪“官衙建筑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是伪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干事是伪总务厅营缮处长等。由于平时的接触较多，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很融洽。

1935年5月21日我当上了“伪文教部大臣”（特任）。头一天晚7时至10时，在伪新京总务厅长官邸，由张景惠（新任伪国务总理大臣）和伪总务厅长长冈隆一郎向我传达了溥仪的任命，次日在伪宫内举行所谓亲任式。我到伪文教部是继郑孝胥的后任。当时的教育形势不太好，1936年，各地方小学校学生数，仅恢复到事变前60%，约80万左右；中学校学生数约5万，高等学校学生数不足1万。因为各地缺少学校，造成失学的学生数目很大。就是进了学校，由于原有的教科书不准使用，新教科书又没有，特别是小学教科书，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在伪文教部内，经编审官任意删改后，还得送到日本国内印刷（说是因为有带色图书，实际是拿到日本去看），印出来的又改，改后再印，并且册数不多，滥行发送，造成有些学生无书，下学期才能看到上学期的教科书等情况。在校的学生和进不去学校、根本失学的学生一样，就是比较好的奉天省内各学校，多半也是这样，其他交通不便的省，实际上等于没有学校。尤其是在1937年春，由伪文教部学务司长都富佃等

作成的“新学制要纲”施行所谓实务教育，缩短中小学校各一年的学习年限，是通过我公布的。造成学生毕业不可能升学，除在中学毕业后去当劳工以外，别无出路。日本侵略者的用意，是要摧残中国青年学生，使之失学，无知无识，以便容易供其驱使和受其统治，并以实务教育来奴化他们，打算叫东北人民永久处于劣等民族的地位。

1937年5月20日我转任“伪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6月30日到东京，住在麻布区伪大使馆内。7月2日，向日本裕仁递交伪皇帝国书并发表了一个所谓声明，大意是要努力和日本亲善，完成所谓日满一德一心的使命，在当时东京各新闻都有登载。最可耻的是在11月间南京被日军攻陷的时候，我还到裕仁处签名祝贺。

1939年秋，伪政府授权我为“满波互设领事馆签定协定全权委员”。在东京伪满大使馆内，和波兰驻日大使签定了满波互设领事馆协定，内容是波兰在哈尔滨、伪满在华沙各设领事馆一处。并发表声明，大意是两国在设立领事馆一点上，已经发生关系了。原来答应对于设领事馆，不等于波兰承认伪满，可是在声明里并未露出来，是存心欺骗世人听闻，妄图提高伪政权的地位。

同年伪政府还授权我为“签订日、满、意贸易协定全权委员”。在东京日本外务省内，和日本外务大臣、意大利经济使节团长，签定了这个贸易协定。

此外，还参加了在东京日本赤十字社内伪民生部大臣孙其昌和日本赤十字社理事长签订的接收日本赤十字社在满洲财产的协定。实际上伪满的红十字社，就是替日本赤十字社办事。

由1938年到1940年期间，我每年一次赴日本各地，慰问日本陆海军医院，京都、大阪、九州、四国、北海道各师团司令

部所在地和横须贺海军医院我都去过，慰问金数目不知多少，都是我做慰问讲话，祝词中多是“武运长久”、“治愈再起”等捧拍的话。

1938年到1940年间我在东京还兼“留日学生会长”；1940年秋，日本宪兵和警察秘密逮捕了留学生10余名，当时未抗议，也不敢抗议，一直到同年底我回长春时还未释放。我为了自己能坐长伪大使、伪大臣的宝座，不关心保护学生，以后虽然放出来几名，听说其中姓石的学生，送到长春后，还判了7年的徒刑。

1940年12月27日，我回到新京转任伪交通部大臣。当时伪交通部主要进行穆稜河修堤和补修所谓国道工程，在各工地设有伪交通部直辖的土木工程处，是合并伪国道局时一同归过来的。伪交通部所管的所谓国道，在各省都有，其中，以北满、东边道和热河为最多，在这些地区的土木工程处，专办补修和加强等工程，所使用的劳工是各省摊派的劳工的一部分，由工程处交给包工人使用。听说交给包工人的劳工，是最苦的，因为包工人只为多赚钱，强迫劳动，克扣给养，使劳工住在阴湿的破席棚内，吃腐坏的粗粮，夜间没有被盖，因之患病死亡的不少。我虽知道当时在穆稜河土木工程处正修河堤，可是，我未到各地去看，也未过问。所谓国道和省省道，是公开的，1942年全境道路总长约8万余公里，不过关东军直接修的军用道路则是保密的。仅就修完的8万余公里的道路推算，也得需要数百万的劳工。尤其是修道的目的是为巩固在满洲的势力，是为日军进行侵略和统治服务的。在北满就是为进攻苏联，在东边道和热河就是为剿灭抗日军。还有修的所谓“哈大”道路，特别宽阔，使用了大批的人力、财力，也是为日军军用方便。我在伪交通部主管这些工作，积极支持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活动，对

于修路劳工所遭受到的灾害却置之不理。

1941年8月我兼任临时“特派赴日谢恩大使张景惠的首席随员”。赴日时，是由大连到神户，来回坐轮船，随员中有冯涵清（重工业会社副总裁）、赫慕侠（军事部参谋司长、中将）、松木侠（总务厅次长）、植木员太郎（新京特别市副市长）、松本益雄（国务总理秘书官）等10余名。还有关东军的马少佐随行。到日本后住在东京帝国旅馆。由张景惠在宫内向裕仁递了伪皇帝的亲书。于当日晚张景惠在帝国旅馆大食堂内招待东条英机内阁总理、各大臣、各团体、各新闻社代表等约200余人。在宴会席上张景惠发表了来日本的使命，是为伪满建国已十年，得到“亲邦”日本的援助，表示谢恩。对日本称“亲邦”，是从此时起的。次日东京各报纸都有登载。在东京期间张景惠领了日本的最高勋一等桐花大绶章，我领了日本的勋一等瑞宝章。在东京祭拜了“明治神宫”、“犬正坟”、“靖国神社”，并进行了慰问日军陆军医院（日本陆军医学校医院）和海军医院（横须贺）等活动。到京都住在京都旅馆。因为我始终是随着张景惠一同行动，对日本侵略者称了“亲邦”，拜了祖坟，慰问了屠杀中国人民的凶手，背叛了祖国，忘掉了自己的祖先，还把沾满中国人血的勋章带到身上，想来真是有愧于列祖列宗，对不起子孙后代。

1941年9月，我兼“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一年）。10月出席了协和会中央本部主办的所谓“全国联合协议会”，是在伪新京协和会馆内举行的，出席人数约200名以上。伪政府方面有伪国务总理以下各部大臣、次长，协和会方面有会长、正副本部长以下各处长，和由各省派来的所谓民间“代表”协议员（是在各“省联合协议会”产生出来的），关东军方面有副参谋长（秦彦三郎）、第四科长（小尾）等。开会第一天午前伪皇帝

溥仪临场，由伪宫内府大臣熙洽念“协和会教语”，然后，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训词。午后协议各省联提出的问题。连续开了三天。协议员们提出的问题。由各部伪次长一答复就叫下情上达，其实伪政府的政策，是丝毫不能变更的，反而由开会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我在这次会上，报告了伪交通部修穆稜河、补修道路和辽河治水计划，要求协议员协力支持，这就是让他们协力供出劳工。

1942年春，我出席了伪省长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伪国务院总务厅会议室内举行的。出席的伪省长有伪奉天省长金荣桂、伪吉林省长阎传绂、伪龙江省长黄富俊、伪热河省长王允卿、伪安东省长丁超、伪牡丹江总省长三谷清、伪兴安各省长和新京特别市长金名世等。伪政府是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各部伪大臣、次长、各局长、伪参议府参议（随意出席），和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关东军副参谋长秦彦三郎等。开会时，由张景惠读伪诏书，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训词，各伪省长报告各省的情况，武部六藏说明本年度的施政方针，各部的大臣说明各部每年要举办的各种事项。会议连续开了三天。我在这次会议上说明了伪交通部1942年对于辽河水系应修的太子河流域蓄水池，彰武县西辽河流域蓄水池等工程，并关于国道、省道各种道路的补修和保护等事项。主要目的是对各伪省长要求供出劳工。

1942年10月我转任伪经济部大臣。1943年春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出席的有伪奉天省长徐绍卿，伪吉林省长金名世，伪龙江省长申振先，伪滨江省长王子衡，伪锦州省长王瑞华，伪新京特别市长张联文等。在这次会议上，我说明了经济部关于收购粮谷时，配给农民棉布、线和棉花等物资准备的情况，并要求各省负担储蓄的总数目约16亿元等问题，结果是，在粮谷

交易场上，以廉价收买了农民的粮谷，高价配给他们必需物资，同时，还叫他们储蓄，把农民辛苦一年的果实换给几尺布，有的因交储蓄，连布也得不到，白白地劳苦了一年。

1941年至1944年我在伪交通部、伪经济部时期，每年都出席这样的伪省长会议，每开一次会，就使老百姓的负担加重一层，以致于使百姓们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3年中我的主要工作是继续加强经济统制网。在钢铁金属方面，调整和取消了几个大会社，把鞍山昭和制钢所和本溪制铁会社等加入满洲重工业会社，取消了采金会社，把采煤各会社统归在满洲炭矿会社，火力、水力、发电统归在满洲电业会社，其他盐业、纤维等会社也都有些调整，并扩大了生活必需品会社的经营范围和各种罐头会社、制糖会社等的联系。这就把东北的工业生产和消费，完全统制在各大特殊会社里，也就是把人民的生命，操纵在日本侵略者手里了。由于大会社的垄断和军事生产，助长了侵略者的力量，延长了侵略时间，造成了小工业者失业、贫困、破产、工商业倒闭等。

同年12月底我参加了在伪新京日满军人会馆举行的“日满经济委员会”会议。会上决定供给日军物资，品目数量详数不知，可是同年度生产的100余万吨铁找不到去向，一定是拿去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了，并且在同年供给了日本国内粮谷约300余万吨。

当时因为向各大会社投资，由伪中央银行滥发纸币约40亿元，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日用生活必需品比1937年的所谓“七·二五”标准价格涨了3—4倍，而伪经济部却把这个负担加在人民的身上，加重各种捐税，并摊派储蓄。由于物价上涨，造成人民生活困难，吃不上、穿不上，由于苛捐杂税，逼的人民没有生活之路。

1942年10月到1944年11月我兼“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委员长是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委员有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稻垣征夫（兴农部次长），卢元善（文教部大臣）、于静远（民生部大臣）等。还有小尾参谋（关东军第四课长）等常出席指导。每月第三个星期五开会一次，在协和会本部长室内举行，主要是对每年联合协议会未能解决的问题，由本部作出解决的办法，征求各委员的意见，有意见随便发言，不发言亦可，委员会不作最后的决定。或就联合协议会已决的问题的处理情况，由协和会内担当者作报告。我以一名委员身份参加了各次的会议。

1944年11月我又转任伪外交部大臣，在12月底出席过“日满开拓委员会”，承认日本移民，帮助日本侵略者推行开拓政策，使中国农民多年开垦的土地被收用，房屋被毁坏，流离失所，有家难归。

1945年4月我作为“特派慰问大使张景惠的首席随员”同去东京，随员是总务厅次长王贤伟，伪宫内府近侍处长毓崇，伪国务总理秘书松本益雄共5名，由伪新京到东京来回都是坐飞机，到东京住在麻布区贵宾馆内，第二天由张景惠到宫内向裕仁递了溥仪的亲书。去的使命是伪满送给日本大米30万吨和一批盐。次日正午在总理官邸出席铃木内阁总理招待宴会，席上，张景惠在答词中大意表示了伪满物质丰富，有实力支持日本作战，满洲的事情请交给我，请放心等语。宴会后，张景惠、松本益雄、铃木、东条英机在另一个室内谈话约半小时，我和王贤伟在其他屋内等候。这次还拜了“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

1945年8月15日之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无条件投降，我也结束了汉奸生涯。